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九月

目 录

• 革命回忆录 •

- 回忆在贺龙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周 龙 (1)
- “你们在青海安家” 刘斯起 (25)
- 回忆朱德同志视察青海军区机关
- 赤胆忠心为人民 郭洪春 (29)
- 怀念英雄的原新正县回民支队

• 宗 教 •

- 青海地区的藏语系佛教与寺院 吴均 (49)
- 互助佑宁寺概况 王剑萍 (84)
- 郭隆寺 (佑宁寺) 历史沿革 吉俊德 (101)
- 同德拉加寺见闻 深 林 (107)
- 关于五屯艺术来信、来稿综述 (114)
- 藏语系佛教对青海地区的社会影响
- 王岩松 (117)
- 青海伊斯兰教概况 马 毓 (134)
-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今昔 绽福寿 (159)
- 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王 册 (175)
- 青海基督教简介 马 毓 (187)

- 解放前佛教居士林的活动情况…… 霞 千 (191)
- 马步芳利用宗教统治各族人民…… 邓靖声 (199)

抗战胜利前后蒋马在重庆的反共活动

…………… 马迪甫 (211)

同仁德仓部落被剿杀的经过

…………… 哇加 拉加 (219)

文史近讯…………… (223)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至十辑目录

索引…………… (225)

回忆在贺龙同志身边 工作的日子里

周 龙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十三岁那年，参加了贺龙军长领导的红三军。此后，从一九三三年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先后在红三军军部保卫队、特务队和红三军、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班工作了五年多时间，从洪湖苏区到长征途中，一直跟着贺龙同志。长期的相处，使我深深感到，贺龙同志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热爱毛泽东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坚决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人平易，关心干部，热爱战士，密切联系群众，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记载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断。

(一)

贺龙同志热爱党，衷心拥护毛泽东同志，坚决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在我跟随他的五年多里，有这样几件事，使人惊心动魄，难以忘怀。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三月，派出坚决执行王明路线的夏曦为代表，来到洪湖，组成

新的中央分局、军委分会，由他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独掌党、军大权。在王明的全力支持下，夏曦在军队和根据地全面贯彻执行王明路线，使湘鄂西本来大好的革命形势逐渐恶化起来。在这期间，贺龙同志既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的斗争，又顾全大局，坚持党内团结，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造成的损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的记忆中，贺龙同志与夏曦在作战原则、肃反、对敌斗争策略和要不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下面记的只是贺龙同志坚决抵制夏曦到处抓“改组派”，大搞肃反扩大化的事。

一九三一年底到一九三二年初，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曾给湘鄂西党组织发来多次指示，把当时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认为湘鄂西苏区内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应该“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夏曦不遗余力地贯彻了这些指示。他不但把肃反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且，在肃反中还把革命阵营中的认识问题，是非问题，一般地违反纪律的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反对过他们的错误路线的人，都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联系起来。他甚至把对敌斗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个人主义的打击报复纠缠在一起，轻率地给许多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AB团”、“国民党”等帽子，当做“反革命”处理。在他控制下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受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

只要他和某几个肃反人员决定，就可以轻易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他们采取逼、供、信和步步株连的作法，使肃反扩大化愈演愈烈。夏曦他们几乎把所有的连排干部都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单独编成好几个连，平时抬担架、罚苦工，战斗打响时发下枪来，叫他们冲杀。这几个连的人，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从一九三一年底到一九三四年夏，夏曦搞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大批有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力量。

在那乌云笼罩、寒流滚滚的日子里，贺龙同志眼看许多优秀干部无端受害，非常痛心，十分苦恼。我见他脸色阴郁，眉头打结，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是独自深思，就是同夏曦争论。尽管错误路线盛行一时，他却大义凛然，主持正义，同错误路线、同夏曦执行的错误肃反政策进行了坚决地斗争。贺龙同志严肃地指出，对于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无疑应该坚决肃清，在这方面的任何疏忽和宽容都是错误的；但绝不能把内部的是非、路线之争，当做敌我矛盾处理，更不能轻信妄断，打击报复，草菅人命。他多次提出必须停止错误的肃反。但夏曦利用他窃据的职权，置贺龙同志的正确意见于不顾，继续一意孤行，并对贺龙同志屡加排斥和诬陷。记得一次宿营下来，夏曦要贺龙同志交代问题，说他在国民党里有声望，“改组派”会利用他的声望进行活动。贺龙同志一下火了，问夏曦有证据没有，夏曦当然拿不出来。贺龙同志斥责他说：“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还有一次是在竹林关，夏曦

把贺龙、关向应同志的警卫员的枪都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同志气的脸色铁青，怒气冲冲地走近夏曦，从腰间掏出白朗宁手枪，叭一声扔在桌子上，说：“你不是要收缴人们的枪支吗？好，我这里还有一支！”在贺龙同志的严厉训斥下，夏曦只得把枪还给了警卫员，逮捕的那两个警卫员也放了。以后，贺龙同志不仅不和夏曦在一起吃饭，走路时也互相不说话，都把眼睛瞪着。夏曦多次企图加害贺龙同志，只是慑于他的声威，才没敢动手。

尽管当时贺龙同志受到排斥，处境困难，但他出于对党的忠诚，对下属干部的了解和爱护，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并亲自放掉了一些无辜被捕的同志。他虽然无权过问捕人杀人的事，但对于被夏曦抓起来的人，凡是听到了，都亲自过问、审查，搞错了的就硬叫夏曦放掉。一个漆黑的夜晚，夏曦一伙又要开始他们的罪恶行动了，贺龙同志闻讯赶到了出事的地点，用手电光逐个详细查看即将遭受杀害的人，看完之后，他勃然大怒，粗声大气地说：“你说他们是‘改组派’，有什么根据？他们跟我革命多年，都成了‘改组派’，真是乱弹琴，赶快给我全部放掉！”三十多个同志被营救了，大家都感动的放声大哭。团长贺炳炎负伤后跟贺龙同志当警卫员，部队开到鹤峰时，知道夏曦要逮捕他，带四个人上了山。他在山上呆了大半天，一回来就被抓住，幸好被贺龙同志发现，才没有被杀掉。现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林同志，是他们拉出去枪毙时，被贺龙同志看见了，极力阻止，才放了回

来。现在尚在为党积极工作的王尚荣、黄新庭、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同志，都是已经被他们捆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同志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红六军创始人之一，军长段德昌同志，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同志的师长王炳南同志，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被杀，都是夏曦等背着贺龙同志干的。那个时候，真是人人自畏，互相之间都不敢讲话，部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但大家仍然不愿意离开红军。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贺龙同志还在，大家都信任他。贺龙同志和大家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贺龙同志对于夏曦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除了严厉驳斥外，为了顾全大局，采取克制态度，继续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不信任也罢，受到诬陷也罢，贺龙同志跟定了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失败不曾使他灰心，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也动摇不了他对党、对革命的耿耿忠心。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为了消灭我们这支革命力量，玩弄了毒辣的一手，他一面派重兵“围剿”红三军，一面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同志进行游说“策反”。熊贡卿到湖北恩施后，先派梁素佛来到红三军驻地联络。梁素佛将熊贡卿写的一封信交给贺龙同志，信中称他要来与“昔日好友”叙旧，并愿意帮助贺龙解脱困境。贺龙同志看信后，敏锐地识破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随即将这一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作了报告。分局“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几天之后，熊贡卿带着

礼物，在红军的“护送”下来到红三军驻地。贺龙同志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亲自与熊贡卿谈话，了解了这次来的全部阴谋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进行破坏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情况。当晚贺龙同志即令廖汉生同志将熊贡卿逮捕。第二天，当廖汉生同志押着熊贡卿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时，贺龙同志站在一块岩石上面，激愤地对部队说：“今天，我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到这里劝降的，这是对我们红军的极大侮辱。同时，他又是蒋介石的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接着，贺龙同志命令二十五团团长刘开绪同志枪毙了熊贡卿。贺龙对国民党反动派“策反”阴谋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凝聚了贺龙同志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包含了贺龙同志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使我们红军战士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后来听说，当蒋介石接到熊贡卿被杀的报告后，气的垂胸顿足。连连哀叹“殊堪惋惜”。

一九三四年春天，敌人纠集重兵向鹤峰进攻，红三军不得不向川黔边境转移。六月，在贵州枫香溪召开的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被迫同意贺龙同志的意见，分局决定在黔东建立根据地，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同时错误的肃反也停止了。这就调动了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经过两、三个月的斗争，创建了纵横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也就在这年八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先遣

队，由湘赣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区）突围，向湘西进发，以策应中央红军向西转移。十月初，红六军团进至贵州的黄平、余庆地区后，在甘溪的遭遇战中受挫，部队被截为数段，减员很大。贺龙同志得知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后，不顾敌军的阻拦截击，立即率红三军全力以赴，南下接应。十月二十四日，终于和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当天即转移到松桃县石梁。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刻，两军胜利会师，无不兴奋激动，鼓舞欢腾。贺龙同志对这支来自毛泽东同志身边的部队，很热情，很爱护。他发动红三军指战员给红六军团送粮送肉、送铺草、还给营以上干部配备了乘马。贺龙同志更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要任弼时等同志向他介绍毛泽东同志的事迹和中央红军反“围剿”及土地革命的经验。他对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政策，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制定的红军纪律，表示真诚拥护；对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表示很大的尊敬。第二天，两军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同志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了中央关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名称的决定；接着他讲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贺龙同志在讲话时亲切地说：“六军团的同志到了这里，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现在，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此后，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总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总政治委员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在贺龙和任弼

时同志的领导下，纠正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进一步加强了红军中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开始了湘鄂川黔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二、六军团接到了遵义会议和中央有关组织问题的电文，得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贺龙同志激动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并表示坚决听从毛主席的指挥。从此，红二、六军团坚决遵循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路线，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的指示，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之间的广阔地区，时而突入白区，时而进行侧击。使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我军所向披靡，连战皆捷。半年时间，经过三十多次大小战斗，粉碎了敌人八十多个团的围攻，不仅完成了牵制进攻中央红军的敌军的战斗任务，而且红二、六军团本身也得到锻炼和发展，由会师时的七千多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并创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个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表现了贺龙同志深刻领会和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在毛泽东同志的及时指导下，他的指挥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取得的一连串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先后调集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我二、六军团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分析了敌我情况后，认为在根据地的内线作战于我不利，决

定突围转移。十一月十九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统率部队，从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经过湘中，西入贵州，到达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原打算在这里再建立一块新的根据地，由于敌情变化，部队继续转移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根据新的形势，向滇东地区转移。在不断的转移中，我军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和善于打运动战的特点，在乌蒙山区同敌人进行了回旋战，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原来，掌握着红四方面军领导大权的张国焘，因为坚持南下逃跑已经失败，不得不放弃天全、庐山，退入西康。在草地上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的行径已经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很大不满。迫于当时的处境，张国焘才准备北上。但他仍妄想把红二、六军团拉过来，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共同反对中央。因此，他利用窃踞的红军总政委的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张国焘电令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来甘孜会合，是图谋控制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后，又要两个军团分作两路向甘孜前进，是妄图离间和分化红二、六军团。因此，红二、六军团一到甘孜，张国焘就进行了种种反党阴谋活动：以迎接红二、六军团为名，派遣工作组，暗中进行挑拨离间；在红二、六军团中散发反党反中央的决议，煽动反对党中

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对红二、六军团的干部送枪送马、发衣给粮、封官许愿，进行拉拢欺骗；甚至企图采取撤换红二、六军团干部等手段，以达到强制红二、六军团同意他的错误路线，和他一起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的罪恶目的。

当时被张国焘劫持的朱德同志对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十分高兴。他对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说：“你们来了，有力量了，我腰肝子硬了，团结工作更好做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红二、六军团领导同志，坚定地 and 朱德同志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伪中央，对他一系列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张国焘搞了个《干部必读》的小册子，贩卖逃跑主义路线，公开反对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贺龙同志看了以后，皱着眉头，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是错误的。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只有北上抗日，才是出路。这个材料不能发，统统烧掉它。”任弼时同志一听，忙劝阻说：“可不能全烧啊，留下几本，带到陕北，见了毛主席，要跟张国焘打官司！”张国焘用物资拉拢贺龙同志，遭到了贺龙同志的严厉拒绝。张国焘派代表到红二、六军团讲话，进行反动宣传，贺龙同志告诉他们：“绝不允许这样做！”贺龙同志还命令红二、六军团指战员不看他们演出的反党戏剧。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提出要召开两军干部联席会议，由他做报告，企图以势压人，从组织上强迫红二、六军团同意他的反动路线。贺龙同志坚决支持任弼时同志，当面向张国焘

说：“你要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先要讲清这个会是什么性质？开会中间如果发生了争论，由谁来做结论？是由你，还是由任弼时同志做？我们是拥护任弼时同志的。你一定要开这个会，想以势压人，莫怪我贺龙不客气，我劝你莫拿南昌起义那个时候的态度来破坏革命了。”贺龙同志当面揭露张国焘历史上的罪恶行径，使得张国焘不得不有所顾忌，只好放弃召开两军联席会议的打算。贺龙同志在红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愤怒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伪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主席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战，我们必须北上，与真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在这场斗争中，贺龙同志还按照朱德同志的意见，以向二、六军团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为理由，巧妙地向张国焘把原属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要了过来。

七月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三十二军，组成了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团又重新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挥。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加上徐向前同志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完全失败，被迫取消伪中央，勉强同意两个方面军一起北上。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战斗，一路向前，走到了草地的边缘，就要走完这艰难的道路了。可是，张国焘竟又

一次提出回头南下，拒绝继续北上。贺龙同志斩钉截铁地对张国焘说：“你还要钻南下这条绝路，那不是找死吗？你要走，广大干部战士不答应！”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继续前进，来到甘肃临洮一带。张国焘始终拒绝跟党中央会合，又提出一个荒谬主张，借口打开国际通道，要把部队拉向青海、新疆。贺龙同志愤怒地说：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贺龙要去找毛主席！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谁也别想把我的部队拉走！”但张国焘野心不死，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密令四方面军由靖远西渡黄河，企图经甘肃西部向新疆逃跑。由于敌军堵截，张国焘本人和两个军未能过河。渡过河的三个军组成西路军，在狭长的河西走廊，受到了十几万的国民党军队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追堵截，惨遭失败。西路军两万多人，苦战四个月，只剩下八百多人进入新疆，另一部分人陆续回到陕北。

这时，党中央、毛主席派邓小平、聂荣臻、左权等同志带领部队西征，前来迎接二、四方面军。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述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贺龙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兴奋地说：“这下子真要见到毛主席了。现在好了，和中央红军会师了，从此我们可以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贺龙、任弼时等同志代表红二方面军向党中央致电表示表示：坚决拥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统一团结，一切服从党的统一决定。对贺龙同

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的坚定立场以及所起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曾一再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记得一九三七年四月，我随从关向应同志参加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向我们询问了很多情况，又问我见没见过张国焘？我汇报了自己在这段的经历。回答说：“我见了张国焘两次，贺老总骂了他两次”。毛主席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赞扬说：“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二）

贺龙同志对同志，对士兵，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处处关心战士，密切联系群众，与广大干部战士同命运、共患难，深受大家的爱戴，享有崇高的威望。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被调到红三军军部警卫班，给贺龙军长当警卫员。他白天走到那里，我们警卫班就跟到那里；晚上他睡觉，我们警卫员就轮流站岗放哨。贺龙同志没有一点架子，待人很和蔼。我刚到警卫班那阵，见到他有些拘谨，一开口就称他“军长”。贺龙同志亲切地对我说：“周伢，再不要一口一个军长了，那样会把我们的关系搞远了。你当了我的警卫员，不要喊我的官名，就喊我贺胡子，或者象老百姓那样，叫我贺老总，随便一点。”从此我也就称他贺老总的了。

贺老总对我们警卫员十分关心，他经常给我们上课，讲革命道理，启发我们的阶级觉悟；空隙时间和我们一起下棋、拉家常、扳手劲；晚上亲自给司务长安